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3-0001-10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

□孙久文 王 邹 蒋 治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要求协调好人口集聚与地区差异、培育经济增长极与追求空间正义、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总量增长与结构转型、发扬本地优势与融入全球市场这五对矛盾关系。瞄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重点明晰区域协调发展的三个重大问题,即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以高质量发展确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共同富裕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以新发展格局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动能,最终可统一归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了更好地以区域协调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亟需顺应经济规律,引导人口空间再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普惠性,推动绿色低碳成为主流发展方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发展格局

DOI:10.16365/j.cnki.11-4054/d.2023.03.006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现代化是数百年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基本趋向,生动展现了人类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历程^[1]。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要求、原则,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区域协调发展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从理论逻辑看,作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美”“实”“效”“协”“共”为鲜明特征^[2],其中“协”即对空间发展提出了均衡、协调与包容的基本要求。从现实逻辑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拥有多达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国土,造就了多样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区域协调发展注定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从实践逻辑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主题,提出了16项重大战略,其中与区域协调发展直接关联的就多达4项,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紧密内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顶层设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

站在继往开来的时代交汇点上,亟待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点,全面剖析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重大问题与实现路径。本文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梳理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即以高质量发展解决总体思路问题,以共同富裕解决价值目标问题,以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空间动能问题,最后设计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方案。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广泛吸收了全球现代化的一般性经验,更充分彰显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风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旨在突破西方现代化面临的困境^[3]。

中国式现代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需要处理好的重点关系,为深刻理解区域协调发展的丰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集聚经济下‘劳动力—岗位’的匹配研究”(2021000945)

作者简介:孙久文(1956—),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邹(1997—),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蒋治(1995—),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富内涵提供了全新视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自觉纠正重经济增长、轻质量优化,重效率提升、轻公平正义,重物质成果、轻人文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不良倾向,避免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失衡状态^[4]。为此,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人口集聚与地区差异、培育经济增长极与追求空间正义、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总量增长与结构转型、发扬本地优势和融入全球市场这五对矛盾关系。

(一)协调人口集聚优势与地区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区域发展协调好人口集聚优势与关注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规模巨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拥有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广阔的统一大市场、较强的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还意味着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面临着巨大挑战。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为少数地区、少数群体服务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以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据此,区域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超大大人口优势,在空间上引导生产要素形成集聚态势,凭借更高密度下的学习、匹配等机制,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生产效率^[5];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在各地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的国情下,人口的技能素养、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存在的显著分化。当前我国人口数量仍保持世界第一,仍有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外转出,能够满足“制造大国”优势下所需的密集劳动需求。同时也要注意,随着人口增速见顶和替代技术应用,现代化的人口驱动力将愈发转向结构上的突破,包括更多居民享受到城市的现代化生活环境、大城市之外区域的内需得到更大释放、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综合技能不断提升、人口和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更加协同,等等。总之,新形势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要按照客观规律强化利用集聚经济效能,引导人口实现合理有序转移,也要因地制宜完善调整区域政策体系,不断帮助特殊类型地区开辟合适发展道路,实现在集聚中走向普遍发展,在发展中营造相对平衡。

(二)协调经济增长极培育与空间均衡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好释放经济增长极潜力与维护空间正义之间的关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达成后,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作为接续奋斗目标,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人群间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能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出发,培育增长极和追求空间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条件,前者是“做大蛋糕”,后者是“分好蛋糕”,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偏废。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考察资本主义城乡发展历程时就发现,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形态的聚集活动中,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化往往也会加大,容易导致以人为本价值丧失、资源空间分配不均、污染空间转嫁等为典型特征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在经济生产高效集聚的基础上追求进一步的空间正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区域发展的基本要求。据此,区域发展一方面要促进人口、资本、技术、土地等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主体,加快提升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活动和人口承载力;另一方面,也要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特定产业、粮食农业、自然生态、边疆领土等方面的功能,不断缩小人均生产总值和平均生活质量差距,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生产力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套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区域结对帮扶、区域市场一体化等机制发挥显著成效。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东部沿海地区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其他地区同样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在迈向物质生活的更高阶段的过程中,人民对正义的感知和追求愈发强烈,城乡之间、城市群之间,甚至同一个城市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更加凸显,一些违背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的深层次制度束缚亟待松绑,发达地区发展的外溢范围和涓滴效应需要加强,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伴随社会发展转入效率与公平并重阶段,未来在壮大优势增长极潜力的基础上,区域发展要重点紧抓保障人民发展机会均等、推进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等分配领域的优化工作。

(三)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好促进区域经济建设与保护地方特色文化的关系。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中国式现代化在夯实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物质基础的

同时,还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合地方历史文化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广泛发挥地域精神对凝聚当地社会力量的主心骨作用。通过挖掘、发扬各地优秀的文化内涵,激发出人民群众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出谋划策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促进物的充实丰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缺乏先进的思想文化引领,极易坠入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陷阱。据此,区域发展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效生产提升社会发展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高度关注当地教育事业和居民精神世界,保护、传承、发扬好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区域经济产业和文化保护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6]。近年来,一系列创新举措得以落地:一方面,形成了新型区域文化开发保护体制机制。例如,在2021年正式设立了首批国家公园,突破了长期以来自然文化资源由行政单元负责的弊端,跨区域的自然文化资源由中央层面牵头统一保护,为盘活地区宝贵文化要素,满足更高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了优质平台。另一方面,以地方独特文旅风貌为抓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在特色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的地区,当地政府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开辟了有效创收渠道,实现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提升了区域内生发展动力。又如,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确立后,各主体、全流域聚力挖掘黄河文化宝库,建立起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1+3+9”规划体系,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四)协调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区域发展协调好保证增量合理水平与加快发展方式转型的关系。处在现代化建设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发展在“量”的基础上,也对“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经济利益最大化驱使,西方国家在工业文明初期多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问题。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式现代化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以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向着美丽中国的愿景进发。

为绘制生产空间高效集约、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美丽中国蓝图,需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到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在集约利用资源要素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维系和谐的人地关系。据此,区域发展一方面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上持续配合发力,建立完善现代经济体系,保证区域经济平稳顺畅运行;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模式,推动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辩证认识这一关系——总量增长并不排斥结构转型,方式转变也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主体功能的地区,要制定科学可行的异质性方案,对于先发优势地区(通常是城市化地区),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产业转型,以自主科技创新和现代化治理为催化剂,强化当地经济发展内生活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并舒缓转型中的阵痛。在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等特殊功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则是守住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底线,在此基础上与跟进地区、先发优势地区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五)协调国内统一大市场与全球市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区域发展协调好壮大本地比较优势、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与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关系。历史表明,战争、殖民、掠夺是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主要手段,给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国际进步力量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同于许多国家受限于国土面积小、禀赋条件弱等因素,我国在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丰富的地域环境支撑下,能够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基础,走出一条“内涵式”发展的和平道路,从而天然地规避了以商品倾销、对外扩张为典型手段的“侵略式”现代化模式。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与世界保持紧密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能够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大势中发扬光大。据此,区域发展一方面要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和全国战略大局,培育壮大当地优势产业,加快融入国内大循环系统,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畅通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关联

配套等方面久久为功,避免陷入要素争夺、重复建设、市场封锁的负和博弈;另一方面,也要放眼海外广阔机遇和全球分工市场,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地结合,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推动更多蕴含中国智慧的产品、服务和标准走向世界,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优质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交流。总之,在国内区域协调共进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好地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发展的普惠红利,为全球各地推进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方案。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高质量发展能确保先发地区率先完成转型目标,同时带动并支持后发地区,以其先进的理念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两步走”蓝图,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平稳实现。

(一)中国式现代化主线转向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至2022年的121.0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突破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2019年底跨越10000美元大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过于重视经济体量增加的传统发展模式愈加不可持续,中国步入增速下行、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转型阵痛期。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向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新时代长征路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7]62-63}。据此,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紧密契合,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8]。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包括:(1)在创新驱动方面,高端创新要素供给增加,创新成果转化速率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平稳推进,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逐渐增强。(2)在协调共进方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驱动产业链、供应链良性运转;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充分释放,激发内需活力;城乡二元结构逐步

消解,城乡深度融合加快。(3)在绿色高效方面,资本、劳动、土地、技术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4)在开放共赢方面,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结构升级,“引进来”和“走出去”向纵深推进,步入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中高端。(5)在共享和谐方面,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达成“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大同目标。

(二)以高质量发展为总体思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高质量发展为科学谋划区域战略、全面实施区域政策、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提供了参照系。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包括:

第一,四大板块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从1999年起,国家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与东部率先战略相配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成型。为打开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四大板块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列探索,增进了区域发展的平衡性^[9]。东部地区发挥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参与高层次国际经济合作并举;中部地区在长江与铁路沿线打造中高端产业集群、承接新兴产业布局 and 转移、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支持淮河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并行;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并重;东北地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并进,以“穷”“堵”“老”为主要表现的区域问题迎刃而解^[10]。四大板块差距会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弥合。

第二,五大经济区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添砖加瓦^[11]。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五大经济区立足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提高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京津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盘活产业链与创新链并举;长江经济带整改全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设计江海陆交通运输体系、释放产业联动优势并行;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快交通枢纽建设、破除广东与港澳制度壁垒并重;长三角对标国际先进科创能力与产业体

系、强化开放型经济集聚功能、改善公共品供给并进；黄河流域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兼顾，区域差距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趋向缩小。

第三，三大功能区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完善以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为骨架的主体功能区制度，同2011年6月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一脉相承。为形成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格局，三大功能区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助力区域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迈向协同。城市化地区不断优化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农产品主产区持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生态功能区稳步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践行了维护人地关系和谐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土空间协调共进的新机制渐趋成熟^[12]。

第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继“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逐年稳步提升，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红利不断释放。为巩固“两横三纵”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城市群统筹推进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关联配套、公共服务均等，塑造了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高质量网络空间格局^[13]，促使城市群内先发城市与后发城市的差距持续缩小，开拓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加关注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发展依托，并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纳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版图。

第五，县域高质量发展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深入贯彻新型城镇化战略，而县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县域是构成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我国关于县城的发展规划较为缺失，对于县城的认知和重视远远不够，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对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补充夯实，有助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当前我国有超过1800个县域单元，其内部发展分化和禀赋异质性很大，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确立不同县域在综合定位、城镇化建设、特色产业等方面的事项。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区域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

基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刻矛盾，实

现区域普遍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本质要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更加强烈，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转向为推进共同富裕。

(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的区域共同富裕趋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共同富裕成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价值目标。特别地，在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后，我国全体人民在实现“强起来”的共同富裕征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深刻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相应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属性而言，由国家统筹的区域战略愈发强调“空间中性”，为的是达到“整体分散”；经济带尺度下的战略更多表现为“基于地区”，旨在实现“优势集中”。“整体分散”与“优势集中”相互作用，成为保障区域共同富裕的催化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注重对若干省区市组成的大区域的统一指导，国家尺度下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先后问世。然而，经济带尺度下的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同样必不可少，为区域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区域共同富裕，国家提出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内的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与城市群、都市圈、国家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等空间战略相配合，在区域共同富裕的探索中行稳致远。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在以“整体分散”为使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汇聚优质要素培育了以城市群、都市圈、国家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增长极，在空间布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公共文化等领域齐抓共管，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逐步走向“优势集中”。

(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象征着中国式现代化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和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丰裕、不同空间和全体人民的普遍繁荣^[14]。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框架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较为简单，主要聚焦缩小区域间生产总值差距；各地方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追赶，强调空间的经济价值和生产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背后还承载着人民生活、育儿养老等更为丰富的意蕴。随着党的十九大将区域协

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一,新时代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更加明确,向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而努力。中国式现代化驱动下三大目标的统一指向,就是实现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是中心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人民至上的发展要求,更加强调从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角度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旨在提高民生社稷福祉、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保障、就业兴业等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是第一动力,加快织密各类基础设施网络是重要手段,进而不断缩小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生活质量差异。

推进共同富裕事业的重点矛盾落脚于各类尺度的空间分化,具体表现为依旧存在的沿海与内陆梯度差距、不断扩大的南北分野、仍未消弭的城乡二元形态、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失衡等问题,其中,城乡差距又是最大的短板。提升“三农”现代化水平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命题。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战略上升至城乡融合视角,今后应在高质量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缩小城乡差距^[15]。一方面,要从粗放型的土地扩张转型为可持续的集约型增长,关注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另一方面,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城乡要素交流畅通、农业现代化综合体系建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领域全面助力乡村振兴,达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把“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九大重点工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处理好区域共同富裕与地区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

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历史进程,并非以“绝对平均”达成迅速的“同步富裕”,而是需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遵循渐进探索、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以浙江为例,作为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浙江将在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协调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推行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等方面,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可供借鉴的经验模式。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布局点,是充分考虑了其在经济发展、地区协调、城乡格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政策传导上有很大推广潜力。从地理特性来看,浙江在有限的面积内囊括了丰富的地理元素。浙江拥有平原、盆地、丘陵、海岛等各种地貌,其“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结构类似于一个缩小版的中国,从中孕育了多样连贯的城乡格局。从发展基础来看,浙江省内的发展平衡度较高。浙江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位居全国前列,其各区县、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改进方向来看,浙江在完善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方面建立的体制机制,有效提高了低收入群体收入,正逐步在先行探索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可供推广复制的模式。2022年,浙江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万元,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位列全国首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到1.9,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取得卓越成就。

然而,中西部地区不可能照搬照抄浙江经验,而是要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参考浙江的经验,制定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共同富裕规划。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空间动能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启存量优化和增量挖掘并进的新局面,力争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从区域分化到空间优化、从分配失衡向共同富裕的转变^[16]。进入新发展阶段,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空间动能。

(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亟待构建新发展格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激增,叠加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和局部地缘冲突等矛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全球化的大势永远不会改变。我国需要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更有力的举措,走出一条主动型、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外新形势适时作出的长远战略决策,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旋律。从国内循环系统来看,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低,由2006年顶峰时的64%降至2022年的34%;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到40%，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66%，与发达国家多达70%的中等收入群体和85%的消费收入结构相比，提升空间还很大^[7]。从国内国际交互系统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领域拓宽、内容更多，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贸易分工的程度更加深入，能够进一步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福祉。

回到国内，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步入中国式现代化快车道，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跃升，极大改善了人民生活 and 综合国力；然而，也需要认清其背后存在的扩张方式粗放、忽视附加值提升、对外依赖过强、环境污染严重、地方分割加剧等深层问题。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25万美元，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我们具备了更充分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条件：在数量规模方面，我们拥有占世界近20%的人口，在地域自然人文方面，我们呈现出多样性丰富的优势。

（二）以新发展格局为空间动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是区域创新。一方面是空间创新。从国内和国际两大空间切入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利益。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注重处理好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闭门造车搞经济，而是要更好地激发内需潜力，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更加主动地吸引世界优质要素为我所用，更加自信地推动中国高质量产品服务、标准体系走向国门，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以此为契机助力国内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是区域产业创新。各地差异化产业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地方在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出符合本地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定位，寻求与周边地区形成产业分工的良性联动。同时，各地的探索势必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本前提，既要克服搞“小而全”的自我封闭小循环，也要避免陷入地区封锁、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误区^[8]。

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指引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与相关空间战略体系形成合力，步调协同，释放更强劲的制度优势。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开放战略等有机衔接起来；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抓住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区域经济增长极再培育等契机，使之迸发出更多内需潜力，优化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

各区域应充分识别自身区位优势、政策融合等独特优势，更加积极地发掘有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地区应率先朝着实现现代化目标而努力。例如，海南在建设自贸试验区的同时，蓬勃开展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一象征全球最高开放水平的特殊功能区域，成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目前，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正在加快实现海南全岛“境内关外”的运行模式；又如，雄安“以新破局”探索区域发展新格局，当前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实现突破，一批基建重点工程顺利推进，高端高新产业加快落地，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成效，在住房保障、区域协同等方面率先改革创新，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城提供雄安样板；再如，作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短板地区，各省沿边城市能够借“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契机，在戍边固防、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的同时，发挥好国际贸易通道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支撑作用。

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展望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区域协调，归结起来的最终价值取向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捍卫了人民中心，扎根于本土实际：一方面，能够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短期利益的诱惑而波动，不被部分群体的利益所绑架，不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态度所掣肘；另一方面，对比全球先发国家现代化的演进历史，立足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国土面积广大、空间分异庞大的复杂国情，能够充分融合国际共性发展经验与本国独特现实矛盾，以稳定、强盛的号召力调动起各地区、各民族的内生动力。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人口劳动力布局方面形成符合经济规律的人口分布,在经济产业发展方面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政府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提供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发展模式选择方面推动绿色低碳成为主流发展方式。

(一)顺应人口流动规律

为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形成规模合理、集聚充分的人口空间格局以保障生产高效和生活便利,需要尊重和顺应人口流动的客观经济规律,关注两方面趋势:一方面,人口向城市地区持续流入的基本方向将长期存在。202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城市化进程转入中低速通道,但相比高收入经济体平均80%的城市化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是要尽力满足人民对更高水平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期待。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根据2021年的统计,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依旧有18%的落差,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未能获得合意的资源与服务。未来应持续在户籍制度改革、安居工程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领域持续发力。二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近年来,农村居民往县城安家落户的趋势愈发明显,外出务工人员往县城回流就业的模式更加突出。县城是连接城与乡的关键中间地带,要根据科学定位和分类引导的原则,重点鼓励大城市周边、发展底子好、产业基础强的县城主动承接农村转出人口。三是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为防止超大、特大城市由“集聚经济”落入“集聚不经济”的陷阱,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契机,借助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手段,赋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激发部分后发地区在吸引、承载人口方面的潜在新动能。例如,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之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成为近年人口涌入的新舞台。对于新兴优势地区,要紧紧把握人口变革的红利机遇,实施产业引导、政策优惠、就业支持、生活配套等综合政策,充分激发人口活力。又如,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继续立足“四水四定”的基本原则,将利益补偿等市场化手段和政府帮扶支持相结合,不断引导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薄弱地区人口转移至更加宜居宜产的地区。

(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大目标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7]69-70},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等体系集合,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为制度保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经济现代化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区域层面的重点工作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并行推进产业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各地禀赋多样性强、发展差异大,能够在“大国雁阵模式”的指引下,通过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的再转移,壮大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独特优势,擦亮“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国家名片。此外,同步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19]。第二,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了实现区域间高效协作,要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为了保证区域间公平竞争,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第三,强化区域社会经济创新驱动力。以国家级新区、国家级高新区等重大区域功能平台为关键载体,先行探索优化创新环境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关键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再逐渐总结出一套可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示范模式。第四,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除了关注陆上区域外,还应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建设海洋强国,最终形成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坚实胜利,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后,区域工作重心转向推进共同富裕,这要求全体公民能更加公平、顺畅地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中,“基本”体现了不可或缺性,包括基本民生服务、基本公用设施、基本公共安全保障等;“公共”体现了政府主导性,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肩负主要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市场力量;“服务”体现了地域专属性,往住局

限在特定空间且不可转移,是决定其在空间上分化和不均的先天特质;“均等”不是“平均”,而是强调机会的公平和可得,兼顾共性需求和个性偏好。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维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质量逐步提升,要做到:第一,在政府角色上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一是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确保权责一致、激励相容。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为指导,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9个方面明确各主体责任。二是畅通政民双向沟通渠道,杜绝公共事业中长期存在“重面子、轻里子”“重生产、轻生活”的不良倾向,深刻回应广大人民对“衣食住行”“教医工养”等民生事务的高度关切。三是关注特殊群体和特殊地区,差异化落地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在制度支撑上夯实多层制度体系保障。一是优化公共财政顶层设计,在事权财权分配、财政自给造血、基层激励导向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改革空间。二是健全政府管理制度,提高公共服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法规层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全流程的决策机制、供给机制、评估机制和追责机制。三是创新多元化主体参与制度安排,具体做法如细分公共服务领域,科学放开、放宽主体准入限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用事业等。第三,在具体实施上要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已有国家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各地要严格遵循不低于国家标准;对于暂无国家统一标准的项目,要立足国家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既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做到量力而行,从当地人民普遍需求和财政实力可承受范围两大方面进行审慎评估、多方论证。

(四)推行绿色发展模式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优势的鲜明底色。在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高污染、高耗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为人诟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动揭示了生态资源与生产价值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全新构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加速绿色发展步伐,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高质量完成以下几点任务:

第一,以结构调整升级助力发展方式转型。具体来看,一是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瞄准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二是推动能源消费清洁循环利用,平衡好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分步骤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三是提升交通运输体系绿色发展水平,倡导绿色出行和公共交通,优化运输耗能和动力方式,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节能化改造。

第二,以区域联防联控推进生态环境治理。重大战略地区要发挥排头兵、先锋队的提升引领作用:一是京津冀地区要实施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环境等领域率先突破,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打造天蓝地绿、水清共荣的模范样板;二是长江经济带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围绕长江流域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系统;三是长三角地区要高水平高标准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依托其综合发展水平高、区域分工体系成熟等优势,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优势;四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水资源作为黄河流域发展规划的最大公约数,开辟出一条节水优先、产业鲜明、资源集约的绿色循环发展道路;五是建设美丽粤港澳大湾区,探索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以绿色金融、绿色人才等独特视角促进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第三,以体制机制改革支撑绿色低碳事业。一是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以法律法规和考核标准压实压紧地方环境保护职责;二是健全多元主体参与和市场化机制,借助税费优惠、确权登记、排放权交易等一揽子工具,激发全社会各类优质要素支持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张亚光,毕悦.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J].管理世界,2023(1):41-56.
- [2]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价值[R/OL].[2023-03-02].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3/02/c_1129407495.htm.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 [4] 孙久文.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与创新

- [4]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109-114.
- [5] DURANTON G, PUGA D.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M].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2004: 2063-2117.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369.
- [7]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22.
- [8] 孙久文, 蒋治, 胡俊彦. 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J]. 地理研究, 2022(7): 1864-1882.
- [9] 李国平, 孙瑀, 朱婷. “十四五”时期优化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若干对策建议[J]. 改革, 2020(8): 30-45.
- [10] 张可云. 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与区域协调发展[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3): 102-108.
- [11] 李兰冰, 刘秉镰.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J]. 管理世界, 2020(5): 36-51.
- [12] 肖金成, 杨开忠, 安树伟, 等. 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与优化[J]. 区域经济评论, 2018(5): 1-9.
- [13] 方创琳. 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J]. 经济地理, 2021(4): 1-7.
- [14] 王维平, 薛俊文.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阐释[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2(1): 13-21.
- [15]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8): 117-129.
- [16] 孙久文, 王邹.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3(1): 32-40.
- [17]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3-03-01].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2/t20230228_1919001.html.
- [18] 孙久文, 蒋治.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骨架与路径构想[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4): 78-87.
- [19] 蒋治, 孙久文, 胡俊彦. 中国共产党工业化实践的历史沿革、理论探索与经验总结[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3-27.

(责任编辑 王玲玲)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UN Jiuwen, WANG Zou, JIANG Zhi

Abstract After w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injected new era connotations into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good coordination among five contradictions, i.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stering economic growth poles and pursuing spatial justi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tal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rrying forward local advantages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market.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ree major issue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e. the general idea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termined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taken as the value go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driving forces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nstructe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can be ultimately attributed to the fundamental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etter through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follow economic laws, to guide the re-layout of population space in accordance with economic law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o improve the inclusivenes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goods, and to make green and low-carbon th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new development pattern